政治科學論叢／第三十八期／民國 97 年 12 月／頁 1～34

尋找國際關係的結構圖

閻嘯平*

摘　要

鑒於國際關係理論的紛紜眾說實爲結構化過程裡的不同成分，因而希望能藉助一種國際關係結構來予以釐清；其作法是透過符號學方法，以逐步建構一張國際關係結構圖：第一步是確認做爲國際關係特殊符碼的「邊界間性」，第二步就倫理關係與價值關係建立一個十字軸，第三步基於十字軸結合起特殊符碼和非特殊符碼，而建構出五個層次的結構圖－文化核心、權力要素、國內政治、邊界要素、天下，並對每一個軸向和每一層結構都做進一步的二項式規劃。希望能透過或借助這樣的結構圖，認識到不同國際關係理論在其建構、結構與解構過程中的形式、位階與意義。

關鍵詞：結構化、符號學、邊界間性、國際關係結構圖

*文化大學政治系副教授，E-mail: hpyen@faculty.pccu.edu.tw
收稿日期：97 年 4 月 10 日；通過日期：97 年 9 月 4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維根斯坦（L. Wittgenstein）：「若有人畫了條明確的界線，我不能承認它就是我一直想畫的那一條，……因爲我根本就沒想畫過。於是可以說，他的概念跟我的不同，但有親緣關係。」
>
> （Wittgenstein, 2001: 54）

引言：尋找國際關係結構圖的遊戲規則

我打算針對國際關係理論的「結構化」（structuralisation），進行一些符號學的研究。[1]

在閱讀當代美國主導的國際關係理論時，常訝其諸家輩起而眼花撩亂。然而，令人疑惑的是：這些嘗領風騷的先後流派每相攻訐，儘管常有導論式著作試行調解，卻像總乏一定的詮釋高度；從而難以明瞭他們在國關結構史裡，各自扮演著什麼角色。

這裡所謂的結構史，意指所有的理論都有其結構；唯若換個角度來看，這些結構也不停地被進行著「解構」（déconstruction）：[2] 它們可以是經由後起者看出了舊論著的缺陷，或更常是因爲現實情境發生了變遷，從而造成許多理論先後被自然地「解中心化」（décentralisation）。換句話說，新出理論固然常始於解除舊理論的結構完整性，但新立結構往往又要被解構於更新出的理論，這樣結構、解構與再結構的過程即形成著某種理論史的結構化。進而言之，當我設想要建構一張國際關係結構圖時，我也知道這仍只是結構化中的一次嘗試－它永遠有待修正，乃至重構。

我打算透過符號學來建構這個結構圖。唯限於篇幅，這裡將不處裡符

---

1 必須指出在這裡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語言學家索緒爾（F. de Saussure, 1980）所創立的「符號學」（sémiologie），而非哲學家皮爾斯（C.S. Peirce）的「記號學」（semiotic）。此外，即便在做爲符號學大本營的法國，用這方法來處理國際關係理論的，大概也只有德拉葉（Y. Delahaye）的一本《邊界與文本》（La Frontière et Le Texte: Pour une sémiotiqu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1977），並且毋庸諱言，該書對我有許多啓發。

2 或需注意「解構」所要解除（dé-）的對象，是可譯爲「建構」或「構成」的 construction，而非一般所謂的「結構」（structure）。然而，建構的過程中必然有其結構歸屬；從而建構與解構就詞源含意而言，即分處結構的兩端，而與之合爲一個「結構化」的進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號學的方法論和認識論，而是直接提出涉及「二項式」關聯的兩種符號學分析法。首先，是巴特所提的「s/z」二項式：就語音學來看，s 和 z 既有共同的齒音特徵，又有發聲或不發聲的區別特徵；透過這種既對立又相通的關聯性，即能小自辨識 poisson（s 音，魚）和 poison（z 音，毒藥）的語音歸屬，大至進衍出相關的音位學系統；甚者，基於這樣的類似方法，還能將若干現實變化乃至文本書寫，推出各自所屬的同質系統（Barthes, 1964: 217）。這裡尤須注意「／」做爲結構斜線的的意義與功用，左右兩端的詞項看似對立，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我們在後面要尋找的「國關性」，可以視爲國際關係的特殊符碼，並得以依此而推出「特殊符碼／非特殊符碼」（code spécifique / code non-spécifique）這組二項式。

其次，是索緒爾所提出的符號＝符徵／符旨（signe = signifiant / signifié）。巴特指出這裡有一個分線「｜」的聯動關係，代表了符號意義形成的過程，並稱其爲「意涵」（signifigation）（Barthes, 1965: 120-126）。換句話說，理解國關問題的重點，在掌握相關話語與國關性的互動過程；同理重看「結構／解構」或「特殊符碼／非特殊符碼」，也都同樣從比較性走向過程性；或更進一步，需同時顧及比較性與過程性，而這時的「／」即意味著「越界」：任何一個尋找共時結構的國關理論，比方摩根索的或瓦爾茲的，都透過不停地自我越界而自身結構化，而他們又自然座落於歷時性結構化中的對應位階。

透過上面兩種符號學二項式形式的方法策略，我將在下面以尋找一系列二項式的內容，來建構一種國際關係的結構圖。建構將分爲三個階段：首先，要透過特殊符碼來尋找國關性；其次要訂出兩組二項式的內容，並將它們座立爲十字軸；一旦確立這兩個基礎，即以較大篇幅，由兩軸四端出發，設想中間五層共時性結構的符碼內容。

壹、對三種特殊符碼重做國關性判斷

德拉葉在其《邊界與文本》一書中，曾指出國際關係的特殊符碼有三派觀點：叢林法則、演員表列與邊界穿越。

就無政府的叢林法則而言，這其實是借用麥勒（Merle, 1982: 41-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說法，亦即指出這始於霍布斯區分自然、社會狀態的社會契約論，經過洛克、盧梭、康德、黑格爾和柏格森而直到阿弘。這種大而化之的歸類法可有不少問題：誠然，它基本上體現了西方自啓蒙以來，尋求以自然法導出合法立國的傾向；但首先這種無政府說詞毋寧像個泛泛的隱喻，畢竟失序現象同樣可以發生在國外或國內；其次即令在自然狀態的判准上，比方霍布斯與盧梭就有天壤差異：再次於前後關係聯繫上，比方阿弘可能更接近未被列名的孟德斯鳩，而後者不但認爲兩種狀態的假說無甚意義，更將重點置於自然資源的狀態；最後，即便阿弘會提到國際關係的無政府現象，但它更重視的是會造成無政府的制度性本質：缺乏壟斷合法暴力的最高當局。後面這種區別之所以重要，在點出國際關係並非就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而是還有擺脫暴力陰影的一片無垠藍天。換句話說，阿弘訂出的國關性問題不大，因爲他花了更多篇幅在經濟、社會等非特殊符碼的範疇，只是其中還有若干缺陷－比方極少涉及純文化領域，而這將在下一小節處理非特殊符碼時會進一步研討。

在演員表列上，德拉葉認爲就是在設定某些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實體，比方國家、政黨、國際組織等等，並強調是「依列舉的這些演員來定義國際關係」（Delahaye, 1977: 14）；只不過，他隨即指出這種設定，將因演員概念與實體名單的爭議而無從確定。然而，我以爲這樣看待或否定演員表列，可能有些失焦了。事實上，德拉葉所列舉的國際組織、國家與政黨，基本上即呼應了一般國關理論所習於設定的三個基本角色－國際、國家與個人。換句話說，重點可能在超越泛泛的演員表列設想，更在於不能靠「列舉演員來定義國際關係」，這不但因爲這些演員本身常帶有更多超越國際關係的非特殊符碼，還因爲這樣做容易流入觸手可及的現實方便性、容易流於「自發」國關學卻不自知；從而重點可能更在於要反過來，從關係下手，亦即從國際關係來確定演員、確定做爲概念性事實的演員：這樣的國際，就可有跨國的組織、公司與族群等演員；個人則可再擴大爲數人、組織、公司等等。只不過，若說是國際關係來確定演員以確定國際關係，問題又回到什麼是國際關係，而這似乎只能由第三派的越界來說明。

德拉葉對第三派觀點極爲滿意，不但認定「邊界」做爲區分國際的「基本現象」，實爲一種充要條件；還同意邊界不致簡化國家的複雜性，從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既得以同時面對國內和國際兩個舞台，又得以同時處理國際化與「解國際化」（désinternationalisation）；此外，他更宣稱這尤其會讓符號學者特感興趣，因爲國界分隔既容有交往過程和意涵過程，又容有實在的交往事實和表意運動，而這一切又可以聯繫起其他領域（Delahaye, 1977: 16）。對我來說，上述的一些符號學方法並未讓我特別興奮，因爲同樣這些方法可用於許許多多其他領域；但邊界本身確是提供了一個很好的運作分析的著力點：首先，就廣義的越界而言，這可以涉及學科*互涉*乃至*互爲*文本、*互爲*主體、*互爲*材料等一切可供「*互爲*」（inter-）之事，而這也將是結構圖裡所有要項之間建構關係束的物質基礎；[3] 其次，就狹義的越界而言，它一方面覓得自立於國界位置上的空間性，二方面獲有區分國內事務與超國家事務的角色場域性，三方面還得以就有無壟斷暴力的制度性，而或暗或明地聯繫並檢視其他領域。換句話說，是含攝在「穿越國界」裡的這三種特性－位置的空間性（邊界）、角色的場域性（越界）和暴力的制度性（無壟斷），合爲「國界間性」（interfrontiéralité）

這個構成國際關係特殊符碼的國關性－它將在國際關係結構圖裡不斷地穿針引線。

貳、建構倫理與價值的國關十字軸

如果接受阿弘對國關本質的看法，即「缺乏壟斷合法暴力的最高當局」，自然會傾向於將連帶而出的戰爭或軍事要素視爲特殊符碼的範疇（但這同時需強調邊界和越界）。然而，既然上一節已論證過非特殊符碼領域的必要性與重要性，那麼就必須處理相關領域的內容問題。我以爲這主要是政治、經濟與文化等三個領域，並從而與軍事合爲國關結構的四個軸向。這說法看似簡單有如常識，但它絕不像一般自發性概念所設想的那般輕鬆；而如果不先行釐清，則十字軸和網絡圖都會礙難執行。有鑑於此，我打算先檢討幾個代表性的相關理論以爲後面建構的依據。

---

[3] 必須指出石之瑜亦曾在國際關係的全球化範疇處理過邊界問題，其物質基點落於狹義的疆界，而方法論探討則針對廣義邊界的「互爲」關係，比方「鞏固疆界與顛覆疆界」。（石之瑜，2005：43-7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首先是馬克斯的觀點，唯同樣是基於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有關於歷史動力的論述卻有兩種認定：一個是較教條的版本，強調下層經濟建築決定了上層政法建築以及意識型態，這是種經濟決定論的說法，而這世界也確是越來越有經濟動力決定階級鬥爭的態勢；另一個是較自由的版本，強調儘管有經濟上的偏重性，但歷史實有三項動力來源，亦即經濟建築、政法制度以及與它們相應的意識型態（朱光潛，1981：8-23）。

波蘭尼（K. Polanyi）反對第一個版本，唯其所批經濟決定論的對象也包括了自由市場經濟。事實上，他一方面指出經濟一向附屬於政治、宗教與社會，只是到十九世紀之後才轉爲強勢；另方面則強調純經濟主義只能帶出一個災難性的烏托邦（Polanyi, 2007）。曼恩（M. Mann）則在強調政治、經濟與意識型態的第二個版本上，看到韋伯主義者恰恰提出政黨、階級與身份與之對應（2007：13）；但他更強調韋伯建構的是政治/軍事權力、經濟權力和思想權力，他自己則要把軍事權力獨立出來，再把思想權力改爲意識型態，從而正式宣佈他有個「獨一無二」的理論結構，即認定社會權力的來源有四：政治、軍事、經濟與意識型態（2007：1）。

波蘭尼指出經濟也依附於社會，曼恩則宣稱「根本就沒有「社會」這個東西」（Mann, 2007: 2）。儘管曼恩的說法可能並未違背涂爾幹命題（要把社會當成事實）的設想性，但我之所以未將社會列入軸向主題，實因另四者全在社會之中；我要處理的是國際「社會」的關係，就像曼恩要論證的是「社會」權力的來源，儘管政治、國家等的抽象性絕不低於社會這個東西。此外，我不以爲文化或思想可以被意識型態所取代：首先，思想背後可能蘊有意識型態，但它並不就是意識型態；其次，雖然政治、經濟、軍事的表現均能歸入廣義的文化，但畢竟有許多生活領域與前三者有所隔離，並更多地屬於狹義的文化；最後，人類的任何活動領域背後都隱有意識型態，就像也都屬於社會一樣，因此無須獨樹一幟。然而，我這樣安排並不表示即不處理意識型態，因爲它必然會在四個領域或層次被自然地處理；事實上，就像也未被列入軸向主題的法律一樣，後者和意識型態將因其與統治權力的關聯，[4] 而會在國關結構中被不斷涉及。

[4] 這裡大體採納傅寇（M. Foucault）的觀點，即以政治哲學在處理權力、法律和眞理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實，我的結構四要項與曼恩不同之處，更重要的還在將它們建構爲兩組二項式：一爲倫理組的「生存倫理基礎／正義倫理理想」、二爲價值組的「繁榮價值基礎／幸福價值理想」。進一步來看，即在倫理面的水平軸上，有亟求生存基礎的軍事端和籲求正義的政治端；在價值面的垂直軸上，則有但求現實繁榮的經濟端與追求理想幸福的文化端。再進一步就符碼關係來看，儘管軍經政文四個軸端都須從邊界和越界這國關性的物質基礎出發，唯就國關特殊符碼的制度性本質而言，這主要存在於戰爭及與其緊緊相連的安全問題之第一個軸端；至於經濟、政治與文化等三個軸端，則主要處於三個國關非特殊符碼領域：這是個極不對等的「1:3」之局，但做爲生存倫理所導出的戰爭陰影又確是不斷縈繞著三個一般領域，並永遠在後面領域中隱含著某種帶有威脅的不確定性。[5] 最後即就此確定性問題來看，首先，無論是橫軸還是縱軸，不但各軸的兩端之間充滿了不確定要素，四個軸向本身的定義問題又帶來更多的不確定；其次，這四個軸向還不斷互涉越界，且有許多範疇常處於混沌狀態。但儘管如此，它們畢竟形成一個有所依循的十字軸，又各有其符碼的屬性依據，只是還須立刻指出：按照四個軸端的甲乙丙丁定位，似乎很自然地顯現出先有生命安全問題，再有生活富裕問題，再有政治正義問題，再到人生幸福問題；唯究其實，其間關係可以極其錯綜複雜，其許多不同的角度判斷則常要追溯到不同的文化基礎，比方就《易》卦第一個週期而言：乾、坤、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泰、否這十二卦中，畢竟先談「需」求才有爭「訟」出「師」，但在需求前先談啓「蒙」教化，出師必出問題則不如多求朋友「比」附。事實上，這裡提到的文化基礎問題，已進入座於十字軸上五層結構的文化核心第一層，爲了繼續說明上的方便，這裡先將國際關係結構圖列之於下，相信這將有助於認識它的建構過程。

三角關係：權力的運轉需要眞理話語制定法律，後者穩定了權力再引導出眞理的效力（Foucault, 2000: 22-24）。唯這裡所謂的眞理倒不如說是意識型態，儘管傅寇對眞理的態度一向有點貶抑。

5 傅寇甚至要顚倒克勞塞維茨的命題，而要說「政治是通過其他方法繼續的戰爭」（Foucault, 2000: 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　國際關係結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五層結構的二項式推演

在這張國際關係結構圖裡，可以看到向十字軸四端發散的五層結構：第一層是做爲一切國關實踐和理論根本的文化核心，第三層國內政策和第五層天下格局固然深深反映著這個核心，第二層和第四層的兩種「邊界」要素－權力和國際－又何嘗不是如此。然而正是在此，做爲國關特殊符碼的「越界」公然呈現出其關鍵作用：座落於第四層的第二個邊界，直指國關性上的狹義國界，它直接處於總體宏觀的位階而動見國際觀瞻；座落於第二層的第一個邊界，則指介於深層文化結構與國家實踐行動之間的權力要素，這是廣義的邊界，卻處於個體微觀的位階，並於整個國關結構化中無所不在。

一、文化核心：處於自然與社會中的「人」

第一層文化核心的相關話語較少出現在一般國關理論中，然而它不但實際左右著國際事務的實踐，也實際深藏於理論背後的種種意識型態之中。事實上，如果沒有這樣潛藏著的文化核心，就不會有相應訴求的理論宣示。杭廷頓呼籲重建純基督文明的美國和預言文明衝突下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後頭沒有自然法與社會契約的啓蒙意識型態嗎？而這後者又與溫特所引霍布斯、洛克和康德的無政府文化做了什麼樣的聯繫呢？福山宣稱歷史終結並宣示最後的人，其直接來源是強調主奴辯證關係的柯耶夫（A. Kojev, 1947）與強調超人式貴族倫理的尼采，但真正根源豈能離開古希臘擴張掠奪的英雄神話？而這後者，又與現實主義以降的西方國關理論有些什麼樣的牽連呢？要瞭解老子的「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豈能不從他的無爲之道出發？如果不先釐清《韓非子》中《解老》和《喻老》與老子的真正關係，又如何能掌握韓非的國關思想呢？孟德斯鳩驚訝於愛好和平的中國竟然允許國內有不同的政治體制，[6] 錢穆指出諸族共處

[6] 孟德斯鳩談的是大清帝國容許轄內的蒙古、西藏等部族仍能維持其固有的法律，並爲此而驚嘆道：「但中國是世界上最追求太平的國家啊！」（Montesquieu, 1982：下冊 3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下的古中國視掠奪好戰者爲夷狄，[7] 這後面到底帶有什麼樣的國關思想傳統？

第一層文化核心基於一組二項式「自然人／社會人」，以此蘊有種種互爲異同與相互越界的可能，並以此做爲深層結構而向四個方向與其他四層領域擴散出去。在這個二項式中，個人做爲自然和社會的中介，他是倒向自然多些、倒向社會多些，還是在其間不斷地移來移去乃至尋求某種中道？其實，無論是自然人或社會人，每個單項又可因所涉類聚體的名目而能再分出一系列二項式，比方「敵／友」關係：或是純以自然人而言，對待自然是在「敵／友」兩端之間的哪個點上？我們今天看到生態物種保育的問題日益搬上國際談判的檯面，但水資源的問題可有源遠流長的好一段歷史：阿斯旺水壩取消了尼羅河的沃土，而後者曾引出最早的幾何丈量學；大禹因爲治水大功而得爲華夏共主，而政治這個「治」的字源即來自治水。又或是單就社會人來看「敵／友」關係，對同一社會的其他人或對其他社會又在敵友間的哪個點上？《舊約》談以牙還牙、《新約》要以德報怨、《論語》說以直報怨，這後面隱藏了什麼樣的社會人？施密特（C. Schmitt）認定政治即分敵友、[8] 傅寇（M. Foucault）認爲「政治就是戰爭」（2000：14），[9] 這後面可是隱藏了什麼文化根源？

對結構主義符號學來說，一旦能認出一定數目像「敵／友」這樣的類聚項，或即得以建構出某種文化核心於一定層次上的結構體。然而，要建構有關文化核心的一般性結構體，其尋覓過程必將是極其複雜而漫長，絕非這裡所能處理；只不過，一旦在結構圖中設定此核心的核心，即已提醒其在整個十字軸上每個要項場域具有不可動搖的地位，而任一理論不管它指涉到哪些結構要項仍得以此核心做爲其真正的本體基礎。

7　錢穆指證三點：⑴其時夷狄並非只處於邊疆，而是也有相當部族散居中原；⑵諸侯貴族與異族通婚者甚多；⑶夷狄與諸夏之分，除在其生活習慣與政治方式不同，更在於前者具有向外的侵略性（1993：39-43）。

8　照施密特的說法：政治敵人可以是美好而善良，可以有商業的利益；但基於其非我族類的外人本性，彼此就會有衝突（Schmitt, 2003: 138-139）。

9　或更精確的說明：「權力的機制就是鎮壓；權力關係的本質是敵對力量的衝突」（Foucault, 2000: 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從文化核心走向國際關係的權力中介

座落於第二層的第一個邊界要素－權力，其定義一直頗有爭議，唯該詞的英文（power）或法文（pouvoir）都同時含有權力和能力之義，因此對待權力一詞最好視之如「權能」。它在倫理橫軸上，游移於人口問題和倫理問題之間；在價值縱軸上，則是在繁榮欲求和幸福判斷之間。

1. 首先來看位於橫軸右端的人口要項，它不但涉及從生存權到人口學的問題，並因其居於制度性國關特殊符碼的位置，而影響或聯繫起其他三種非特殊符碼的領域。做爲人口項，基本上反映著個人生命所固有的二項式「死亡／存活」，這是生命形式的「取消」與「獲得」，而後者除了消極的「活著」還有積極的「延壽」；從而或可訂出一個依附於社會的微觀個體二項式「生死／延壽」，這樣結合起社會性的權力考量則爲「人命的生殺權／人口的調節權」。傅寇曾以其特有的表達方式，指出權力的表現始於生殺之權，而後要到十八世紀中葉這種「生命權力」才特別慮及物種生命的人口調節問題，並爲了要配合才有人口學、資源與居民關係評估、財富與壽命關係圖解等組合理論（Foucault, 2002: 101）。事實上，後面兩項理論就像其他許多相關問題一樣，都屬於人口場域，而戴馬蒂（M. Delmas-Marty）或即著眼於此，在她總結當前「法的世界化」時，稱社會問題已可改爲「人口」問題（2000：117）。

其實，針對戴馬蒂的說法可有兩種認知態度，亦即從一般到特殊或從特殊到一般，來掌握「人口權」的意義。第一種在就一般的人口論話語，來涵蓋生殺權裡的戰爭現象與調節權裡的人口考量：回到歷史，柏拉圖指出哲王的墮落始於不再能計算最適公民數，隨後即有理想國的退化；放進當代，人口學家索維（A. Sauvy）乾脆盤點政府所有部會與人口學的關係，其中國防畢竟只佔了一個小小部分（1959：382-383）。或再換個方向來看：放進歷時，傅寇所論生命權力的社會源頭，至少不能算進古希臘和古中國；放進共時，則還須考慮傅寇所見真實權力流動下的的人口機制[10]。

[10] 「統治權理論一開始就面對著複雜的權力，這已不是政治術語上的權力，而是能力、力量和可能性，……〔因爲從一開始就沒有〕一個根本性的權力統一體，而無論其形象是君主還是國家。……統治權理論是個主體和臣民、單數權力和複數權力、合法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第二種態度在從特殊到一般，亦即以國關性裡的暴力制度性爲基點，進看人口問題如何聯繫起國關問題？雅典的參軍權曾經如此緊連著公民人數的擴張，從梭倫（Solon）開始賦予富農的重裝步兵公民權，到百多年後的海權帝國還需落實貧民槳手成爲全權公民。管仲相齊時，興農魚商鹽之利，行農戶軍籍之制，結果桓公能九合諸侯而不以兵車之力－關鍵或始於《牧民》第一句的人口論：「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

從梭倫到管仲，人口場域裡的權能要素早已存在，種種調節人口的方式運作於國內而連動於國外，「生殺權／調節權」的國關延伸早已超出制度性暴力問題，而在邊界和越界上不斷作用於種種非特殊符碼的國關場域。

2. 從生存軸向下移到繁榮軸向，就在這轉折的過程中，霍布斯還在維護擺脫內戰的生命權，洛克已強調獨立於它的財產權，盧梭則看到從自然狀態轉到社會分工帶來的繁榮枷鎖。但無論如何，整個啓蒙時代像盧梭這樣批判「進步」的實屬特例。唯依照傅寇的判斷，百科全書派主要的籲求與貢獻不在反宗教或推動革命，而在推廣技術和知識的同質化 ——「科技」（Foucault, 2000: 171）。

再進一步看，從生存軸的人口權到繁榮軸的科技權，亦即從存活著到活得好，每每有其科技的現實需求。誠然，人口權裡的生殺或延壽問題都要受到武器乃至一般科技的影響，但將科技直接聯繫起經濟繁榮走向可能更爲適當：畢竟技術的緣起和人類的經濟勞動密不可分，而近代科學的成就與其說是來自國家對科研的大力支持，不如強調後者與地理大發現帶來經濟利益的密切關係（Bernal, 1959: 214-215）。

這項科技權或可概分爲一組二項式「工具利用權／科技自主權」。芬伯格（A. Feenbeg）以其爲技術的工具理論與實體理論（2005：4-7），但爲配合這裡的權力軸，我建議採用「利用權／自主權」來說明問題，而其中關鍵或在科技「中立」的弔詭性。首先就利用權而言，科技做爲中立的工具，自然能被人人使用，若有麻煩也只能來自使用者而非其自身；但正是在這不可避免的使用者層次，科技化身爲權力和財富的工具，進而總要

和法律的循環關係」（Foucault, 2000: 38-3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潛在且非中性的權力機制：羅馬軍團同意迦太基求和，但要後者交出所有的兵器與戰船；托勒密定律獲得羅馬教廷的認可，而哥白尼的地球繞日說則要在死後才敢發表；今日西方強權主導的的智慧財產權，能合法延緩落後國家競爭力－儘管知識可因自然分享，而獲得一定良性循環的益擴益增。

其次就自主權來看，堅持客觀研究和價值中立的科技標準，在一定程度上帶出真理的普遍性與不分情境的效率性，進而體現爲某種方法論下的自主實體與強勢主導的社會實在；走到極端，資本主義得挾其去情境化的技術效率，以科技之名藏權力之實，而合法引出並主導經濟全球化。這樣，柏拉圖存於虛空的理型下降至現實世界，科技超越了波普視爲「世界3」的科學理論界，而進升至「世界4」的科技現實界：它將整個現實世界轉化爲被動員的原材料，進而將使用者引出連帶承擔的義務－結果，當科技實體論走到這一步時，它已是另一種同語反復的「環境決定論」。然而，像這樣的決定論永遠只能是一種片面表達法：做爲一種自主性實體，它無從消解其自身在自我組織上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也不能否定被其定位而又能對其定位的自在主體所自有的自反性與主動性。

如果人口權還常佇留在生命的基本需求面，科技權則已正式踏進生活的物化欲望面。然而科技權並未擺脫國關制度性的暴力問題，尤其在做爲自主實體上造就了核威懾下的尚武和平與恐怖主義的全民戰爭，並從而在相關的科技利用權上徹底維繫和助長了國關強權乃至帝國主義。但是科技權畢竟也能超出制度性暴力的格局：就最中性而積極的角度來看，不論是在工具的利用上還是在科技自主下，都足以在農產、醫療等方面直接助益於生命的存活與人口的協調；然而，隨著生存的簡單需求轉向物化的繁榮欲望，工具的利用將因科技的自主而加速扭曲了經濟、政治、文化等的「資本」正義；換句話說，科技權所涉及的一切中立弔詭問題，勢必進而面臨公正判斷的正義倫理。

3. 從繁榮軸往左上方移動，像是將物質利益移向並增加精神利益上的考量，來到做爲生存軸向對立面的正義軸向，來到了權力層的倫理項。然而這裡所謂的「對立」，只是指二項式橫軸形式上出現了兩端，但右端的生殺權既非絕對的惡，左端的倫理權也非最終的善。事實上，雙方都屬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廣義的「倫理」範疇，只是右端較偏向物質性基礎，左端較偏向心理性理想－說是「較偏向」，因爲雙方都不能完全獨立於心理或物質：此所以在右端基礎上，還要從較單一的性命生殺權推往較全面的人口調節權，而併稱爲人口權；在左端理想上，則要從較相對性的責任倫理權推向較絕對性的心志倫理權，並合稱爲倫理權。將後者區分爲「責任／心志」二項式是韋伯的作法，類似的還有胡塞爾區分「倫理經驗主義／先驗絕對主義」…乃至於亞里斯多德的「相對標準／絕對標準」—— 惟其間關係絕非簡單的類比可以道盡。

對韋伯而言，心志倫理屬於公團主義者或基督徒，若他們行動所造成了什麼惡果，「責任將不在他們，而在整個世界其他人的愚昧，或甚至在這正是上帝的意志」（Weber, 1985: 211）；責任倫理則猶如政治家的倫理，他願意一肩承擔自己行動的可見後果。值得注意的是，這組二項式固有其認知上的方便性，卻也有一定的不確定性。或即基於這種方便性，所以里拉（M. Lilla）著書點名海德格、施密特、班雅明、柯耶夫、傅寇和德里達這六位現代思潮大師，直指他們的政治態度就是不負責任，但知觀賞理念運作而脫離了日常事物與政治生活（2003：45）。然而這組二項式實有其不確定處，比方儘管韋伯認定「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的併存永不可能」（2003：213），但他終究期待這樣的政治家能結合起心志倫理的感召（2003：220），只是後果的災難性或非其所能預見。

事實上，責任倫理像是某種結合起功利主義的後果主義，阿弘曾據以理出國際關係兩種後果責任：一爲要求在「事實／價值」間做最好處置的「智慧道德」，它不會妄求取消所有的矛盾，而是追求要能達成最佳的協議；二爲堅持要按照行動後果來檢討，而非按照全部企圖來要求的「責任道德」，比方裁軍目的在避免衝突或戰敗，而非爲了理想的和平。換句話說，阿弘訴求的是能解決問題的責任倫理，只是就正義層面而言究竟能如何看待這樣的倫理觀呢？且以亞里斯多德以來所著稱的二項式「程序正義／目的正義」來看：責任倫理在實踐程序中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合乎正義，關鍵在當事人所顧及的後果常亦有某種程度的心志倫理，而且可能是有爭議的正義概念。

亞里斯多德在其《政治學》中，開宗明義即道：人不但要活，並且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活得好；而所謂活得好，就是能在城邦裡生活（Aristole, 1981: 7）。然後，他整部政治學就是在建構他的六類政體學：他指出君主、貴族、民主三種優良政體，卻隨即表明它們在現實世界難以存活；他指出僭主、寡頭、貧民三種常見的較壞政體，卻明言後者倒是三者中最好的政體，只不過貧民民主即需放棄全民求富的繁榮欲望。換句話說，亞里斯多德從倫理橫軸右端的生存項，直接走向左端政體性的平等項，略過了價值縱軸下端的繁榮項，不能真正面對乃至解決經濟財富不平等的問題，而這就是權力層第四個藝術項的任務。

4. 從正義軸往右上方移動，像是將善惡的倫理判斷移向好壞的價值判斷，來到做爲繁榮軸向對立面的幸福軸向，亦即又一次來到較偏物質與較偏心理的實在語境。只不過，這裡立刻要引起一個疑問：像「藝術」如此超然之物能與權力要素相聯繫嗎？

通常將繪畫、樂曲、詩文等視爲藝術成品，其價格高低直接代換成商品的權力場，其好壞判斷則常伴隨著審美的權力場——比方當前大幅炒作的藝品，常即映現出投資者的商譽或暴發戶的角力，而這一切既像在呼應著李歐塔（J.-F. Lyotard）所斷言的後現代藝術再無審美標準可言（1988：26-27）。換句話說，一般所認知的藝術不但涉及市場地位的權力，而且後者所憑藉的認知和判定權力還要不斷地變動。但在這張結構圖裡，藝術權還要指向另一個層面。它有點像將社會建制裡的文化場域，視如與國家、市場區隔開的「生活世界」；這在藝術權的層次，好似聯繫起「後新儒家」所謂的「生活藝術」。但究其實，這裡所要的藝術權，毋寧更接近中國傳統的「人生藝術」：藝術的本體或在藝品，卻更在人生；藝術的美好或在心情娛樂，卻更在人品修養；藝術的價值或在向外之所得，卻更在涵養之深厚：「藝術屬於全人生，而爲個人品第高低之準則所在」（錢穆，2000：249）。

這樣，在權力的藝術項上也得出了一組二項式：「物化藝術／人生藝術」。物化體現了人對物品必然的聯繫關係，取捨依戀之間當即呈現出藝術的評價高低；評價若倒向「商品拜物教」，是即以商品價格凌越於藝術價值。然而，儘管在當前的全球資本主義化下，知識套上經濟而文化需爲產業，國家不分貧富一律向錢看，但民情生態的負面後果也決不能輕忽。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人生藝術或能爲四個權力項提供適當的總結：它並不排斥物化聯繫，畢竟要拒絕物質生活是不可能的也無此必要；但人生又絕非只能談物質生活，而是還能有修齊治平的個人倫理修業、還能有民胞物與的立命立心情懷，像是在「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論語》述而之六章）中，履行那樂天知命的人生藝術。

從掌握別人的生殺大權到掌握自己的人生藝術，從外部的權力彰顯來到自我的超克權力，座落著第二圈十字軸的四組權力要素二項式：「生殺／調節」的人口權、「利用／自主」的科技權、「責任／心志」的倫理權、「物化／生命」的藝術權。它們既有對立間的聯繫，又在迂迴中轉進：無論是橫向倫理軸裡的人口權與倫理權，還是縱向價值軸裡的科技權和藝術權，都於自在而互爲中有其千絲萬縷的聯繫：結構圖上從人口權往科技、倫理、藝術權的順時針走向，於現實運作中甚至可以逆時起落乃至脫落跳躍；事實上，它們總在進進退退地徘徊著，期待某條迂迴的道路終屬最爲可行。這條道路不論長短寬窄簡單複雜，都在以舊有權力之名挾新提符碼之實，而能以邊界身份串聯起文化核心與實際社會，並從而得順承此路建構出十字軸上後三層的格局。

三、處於國家與天下之間的越界方案

從第三層到第五層，進入了一般國關理論的常屬體制：就像一般所謂「外交是內政的延長」，第三層直指「國內政治」所含的政策方案，第五層爲「天下」所含的世界社會，第四層則以「國界」的身份串聯起越界的跨國關係。當《老子》五十四章說道：「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是即對三、五兩層的明確定位；而第五十七章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則「奇正無事」恰爲扮演串連角色的國際性邊際策略。爲了描述上的方便，這裡將不再像前面那樣一層一層的分開處理，而是就十字軸的四個面向進行一次三層的綜合分析與推演。

㈠從求生存的人口權建構「社會安全－和戰之道－戰略全球化」

從赫拉克利特（Heracleitus）認定一切都是鬥爭、蒙田（Montaine）否定真有朋友這回事，到施密特定義政治即爲劃清敵我、傅寇宣稱政治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戰爭的延續，似乎西方文化核心中一直隱有強調敵意的政治哲學。或許即從這裡出發，基於最單純的制度性壟斷暴力，看到國內政治的樣板是警政司法，國際現實是無政府狀態下的軍力對比，運作於其間的則是做爲「戰爭策略」的邊界要素。換句話說，無論人口問題是否不止生殺考量，只要影響者或決策者著迷於這樣簡略的原始謎思，就可能將內戰危機類比爲國際現實，此所以現實主義者總喜歡引證霍布斯，而《利維坦》甚至因此而主張君主有專制的權利。他們建構的是最簡單又最極端的「社會安全／軍事全球化」，甚至會以涉外軍事觀點對國民身家無限上綱，從而做爲和戰之道的邊界策略既對外也對內。往往，無論在實踐上是否會走到如此極端，這股謎思常是一般國關研究的起點；只是畢竟人口權並非僅有生殺問題，而是還有延壽上正面而積極的調節考量，並從而得以對國政與天下各自建構出一組二項式。

在國內政治的社會安全面，有一組已屬尋常而明瞭的二項式「警政司法／社會福利」。今天絕大多數國家都要推行健保、撫養、工安、撫恤等福利政策，其相關監督已成爲警政司法的主要服務項目；儘管各國施行之間常有程度上的差別，終是早已成爲國際競賽的一組參照指標。因此，軍事全球化合法地轉爲針對和平的戰略全球化，其二項式則爲「均勢遊戲／和平遊戲」。然而，均勢遊戲絕非當代專利，強秦之下才有合縱，一旦完成兼併即再無國際關係可言－除非發生下一次的「合久必分」；唯究其實，軍力確屬均勢的重要考量，正是在避免被統一的情況下，軍事性的均勢遊戲才會一直成爲國關理論的重要對象。事實上，當前在均勢遊戲上有兩種趨勢，一爲加諸生存威脅的威懾遊戲，它包括核威懾與恐怖戰爭；二爲減少生存威脅的避戰遊戲，比方羅斯曼（P. Rossman）指出若干類似「五角大廈」戰爭遊戲的和平演練（2007：99-113）。

國際上的和平遊戲直承國內政治的社會福利，而當前亦有兩種趨勢：一是競賽性和平遊戲，就像上面提到的參照指標，在某種程度上也像增強實踐了《管子‧牧民》所謂的「國多財則遠者來，地闢舉則民留處」；二是規劃性的和平遊戲，比方聯合國對第三世界的濟貧計畫、無疆界組織的賑荒、醫療等救援行動。無論和平遊戲是競賽性還是規劃性，都直承人口調節的延壽理想，在中國可上推至「庶富教」或「禮運大同」等的民本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心，在西方也能聯繫上「以德報怨」這樣以敵爲友的宗教文化。

在國內社會安全與國外全球戰略之間，在強調生殺的「警政司法／均勢遊戲」與延壽調節的「社會福利／和平遊戲」之間，這是做爲邊界性策略的和戰之道：配合著戰爭取向或和平取向，而有「霸道／王道」的二項式組合。強秦的快速覆亡，總讓中國對法家霸術有所警惕；萊庫古（Lycurgus）使斯巴達稱霸四百年，帶給柏拉圖及其後代無盡想像。但無論如何，做爲生存倫理的五層內含絕不可能片面孤立，和平遊戲中社會人權的高低緊倚著經濟的榮枯，均勢遊戲中恐怖主義的消除更要靠族群問題的公正處理，而這一切還待全球文化的逐級昇華。

㈡從求繁榮與科技權建構「經濟發展－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

今天，只要看看現代的五次技術革命——一七七一年的紡織產業革命、一八二九年的蒸氣運輸、一八七五年的鋼電重工業、一九〇八年的汽車規模化、一九七一年的信息遠傳（Perez, 2007: 15-27），看到一次次帶出的經濟擴張與強國變遷，[11] 大概即難以否認工商經濟的影響力還在與日俱增，且其中關鍵恰在益發突出的科技權。

如果一九〇八年福特車廠的第一輛 T 型車代表著福特主義的來臨，則現在早已進入了後福特時代：T 型車的時代還只求有能用的車，現在則要求還要有種種不同配件精飾。經濟史透過福特斷代所透露出的信息，隱喻了科技權的逐級變遷現象：較低水平的民生用品隨著科技突破而提升至較高水平的用品；但由於科學和技術本質性的競逐創新，民生經濟像是從量變來到質變而走向越來越精緻的多變，同時科技也進一步登堂入室地以自主實體的身份化爲科技經濟。於是，國家經濟發展建構出一組二項式「民生經濟／科技經濟」。自古以來一直服務於民生經濟的科技，現在已形成自主的經濟實體，而其大好形勢直接展現於幾個方面：首先，科研本身的技術潛力已明白造就了所謂的知識經濟；其次，科技學的活動能進而構成

[11] 就一定的「技術決定論」來看，在這五次技術革命中，前兩次以英國爲核心，第三次以德國和美國爲核心並趕上了英國經濟，第四次一開始是德、美競逐核心，其後美國則主導了最後兩次的技術革命，也穩坐第一經濟強權的地位（Perez, 2007: 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更強大的「行動者網絡」，[12] 而其行動者同時包括了人、科技產品與相應社會；再次，科技研創所需金錢和人力資本之龐大，對大多數國家已能大到動搖國本的地步；最後，一向利用科技來支持食衣住行等的傳統經濟活動，現在常因新科技進而要求更新活動內容與方式。

從國家經濟發展到經濟全球化，其間有個邊界要素爲「市場經濟」。儘管自斯密以來已習於將它視如自由經濟的型態，我們卻知道它一向難有真正的自由；儘管自萊庫古、柏拉圖以來不斷有人敵視市場經濟，但是不可能沒有做爲市場基礎的交換行爲；儘管市場經濟運作有其結構性缺陷，卻也因而提供了互助精神乃至部分社會主義的切入點。因此，不妨以中性角度來看待市場經濟，它必然有一組二項式「自由／管理」，並在它們之間有著不斷游移的協調。然而，自從蘇聯集團瓦解以來，鐘擺顯然向自由市場傾斜，並再次以資本主義之名統領著經濟全球化。

今天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加上信息遠傳的第五次技術革命，出現了兩種不可輕忽的現象：首先，資本主義的霸道給市場和次級國家的關係帶來質變：在美國法律制度或 OECD 俱樂部條款的強勢推銷下，弱國在經濟乃至文化形式上淪爲新殖民體制（Delmas-Marty, 2001: 17-18）；各國爲了吸引跨國企業而順從國際資本，造成了市場凌於國家之上；在多國企業唯利是圖的自如移動下，或將導致中產階級的消失乃至民主的崩潰。其次，也給經濟活動帶來了質變：古典經濟學所輕忽的信息因素，今天已躍升爲信息經濟學這樣一門顯學；傳統上專注於服務產業界的金融業，現在明擺著與生產資本對等的金融資本[13]——同樣是基於信息科技，生產資本還有落實的地域性和時間性限制，金融資本則能最快速地穿越時空，結果金錢怪獸所帶出的毀滅性創新往往一發不可收拾。

或許，一則基於經濟學是社會科學界的科學主義楷模，二則基於信息科技還在迅速創生階段，三則如何從信息轉爲知識還是個難以解決的大工

[12] 這裡涉及一種基於關係本體論的「行動者網絡理論」，他（它）們甚至可以再組建有權力的聯盟（Sismondo, 2007: 84-96）。

[13] 這裡借用佩蕾絲（C. Perez）的說法：金融資本指資本持有人的標準和行爲只在以貨幣的形式，來擁有財富及使其增值；本質上，「金融資本正是重新配置和重新分配財富的行爲者」（2007：80-8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程，因此不妨將經濟全球化的二項式訂爲「資本主義／科知管理」：就像從故事落實爲敘事，從往事落實爲歷史，都是從茫茫無限萃取出明確的有限；信息革命以來，科技界也一直想將飛躍的信息容量落實爲具體的知識與智慧。就金融資本界而言，面對全球熱錢伴隨信息革命所帶出的自組織遊戲，顯然需要就科技知識的解決方案進行長期跟進的尋覓；就飛躍的信息量而言：如何就其元形式提出複雜學等的認知與對策？如何就其大雜燴式的形象落實爲「世界大腦」式的全球數字地圖？如何就理想的全球性集體智慧推倒專家與一般人民間的藩籬？（Rossman, 2007: 53）只不過，當我們在肯定科知管理的必要性時，卻也立刻能了解後面這項突破藩籬的說法難免流於一定程度的空想——畢竟專業書市一直都存在，人際聊天也從未斷過，可資本主義唯利是圖的本質仍在加寬這道藩籬。似乎就在經濟全球化中，在資本主義和科技管理之間，有一道裂縫還須透過其他結構層來解決，因爲它之所以是問題常因是其在後者中成爲問題：波普就民主的政治考量，認爲電視內容必須予以管制，因爲科技資本主義扭曲了民主原則。[14]

㈢從求正義的倫理權建構「憲政發展－解放政治－政治全球化」

萊庫古立法時，強調不立文字地訴諸慣例，奠定了斯巴達稱霸希臘四百年的貴族共和制。在這個體制中，兩個國王加上 28 位貴族，合爲審議國政的 30 人元老院，但若干國家大事還是要公民表決，因此是一種容有君主、民主成份的貴族共和。馬基維利盛讚羅馬四百年的貴族共和，卻仍不忘強調一切政體都是混合制。然而無論是什麼樣的混合政體，要能像萊庫古斯巴達或共和羅馬那樣名垂史冊，還得看相關建制能否配合憲政主軸；進而言之，即能否像孟德斯鳩那樣，瞭解民、刑、商等法律與風俗、習慣、人口、自然狀態等條件務須依隨憲法精神。只不過孟德斯鳩雖然渲染了英國美好的民主憲政，卻仍是輕忽了黨派族群的問題；而若將後面這類問題拉回古代，其實仍不乏若干解決先例，比方古雅典的克里斯提尼

[14] 「電視史開始的時候還相當不錯；……起初幾乎沒有競爭，公眾的需求還沒被發展開來。……後來電視台說：『我們應該提供觀眾等著的東西』，……只靠收視率統計就好了。……這樣做就像合乎了「民主原則」」（Popper, 1994: 23-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lesisthenes），即曾打散三方地域民代並重新混編政團，從而奠定了雅典民主積極又穩定的發展基礎。於是或能這樣看，即無論是基於什麼樣的信念而執著於民選的民主，都應有責任和智慧去認清並維護實際上的「混合民主」：就混合而言，如何拿捏各種體制基礎的差異性與制衡度？就民主而言，如何避免墜入片面性內鬥與外鬥的民粹激情？

然而無論如何，混合民主只能是憲政發展中政權或政體的「政」，而未正式進入任何政體都需要落實治理的「治」。後者直接涉及兩個範疇，一個是近來漸成顯學的「善治」話語，儘管這類論述在中國已有源遠流長的文字記錄；[15] 另一個是行政體制的「科層」話語，這曾是蘇格拉底一直期待的專業官僚，而中國則早已建立過韋伯一再稱羨的「士人政府」（Weber, 1985: 170, 175）。這樣，或即能合理地爲憲政發展建構一組二項式「混合政體／科層善治」。

從國家的憲政發展到政治全球化，其間的邊界要素爲追求平等的「解放政治」。解放的對象是受壓迫者，就逐級倫理來看，則由生存的基本人權，到經濟的生活權、發展權，到政治的公民權、兩性權，再到文化的族群權、動物權、生態權等等，一切都涉及一組二項式「消極的平等/積極的公正」。上面談到憲政發展時，例舉的是混合民主，定名的則爲混合政體－前者就人數而言最爲平等，後者則還要考慮到宗教[16] 或風俗等並立的公正性，而任何混合政體都要避免因墮落而掉進最不公正的專制政體；至於科層善治，則要看行政菁英與人民大眾有什麼樣的不平等因素，而兩者的對等關係又如何能達致公正。但這種國家層次的處理，移到國際舞台上則將略有不同。

政治全球化的二項式爲「民主主義／倫理協作」。就像經濟全球化中目前是資本主義當道，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則是民主蔚爲主流。儘管我對資

---

[15] 我們立刻可以想到中國歷代對前朝所修的史書、《貞觀政要》、《資治通鑑》或《三通》等等；而按照錢穆的說法，則是經、史、子、集共爲中國政治學的內容，前二者處理實際政務的歷史面，後兩者涉及實際政務的個人面（2000：187-196）。

[16] 法國的國際法學者戴瑪蒂在推崇平等、民主等人權時，曾特別提到伊斯蘭地區的態度：原則上，「神啓」的「高尚眞理」容許來自聖意的歧視，無需抗辯訴求平等的「推斷眞理」（Delmas-Marty, 2001: 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時代性」不甚滿意，因爲它們代表了某種歷時侷限，不像另一組均勢遊戲具有共時的超越性；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正因歷時本身所代表的相對性，也就賦予了「倫理協作」一定的合法性。事實上，十字軸橫向是從倫理基礎到倫理理想，亦即暗指倫理典範所帶有的想象性與相對的不確定性，而這可以就相關的人權法案得出若干證據：一九五〇年的《歐洲人權公約》提出了即便在歐洲也屬陳義過高的法條，一九八一年的《非洲人權與民族權利憲章》特別突出了家庭地位、民族解放與完整環境的權利，一九九四年的《阿拉伯人權憲章》則強調宗教信仰的啓迪與阿拉伯民族對西方文化的貢獻；但問題關鍵更在於：一九六九年的《美洲人權公約》未獲美國的同意加入，非洲人權憲章完全不提人權不得克減問題，阿拉伯憲章則是至今尚未得到批准（Delmas-Marty, 2001: 21-31）。

正是面臨很多極大的差異點，全球倫理才需進行進行政治協調，而其難度恰恰源自一項國關性弔詭，即「非霸權主義」的統一很難實現，而「霸權主義」的統一又難以接受（Delmas-Marty, 2001: 90）。從而首要工作應設計若干技術考量：即便要爲倫理立法，也需保留某種程度的模糊，比方司法解釋餘地或國家評斷餘地；協調程序寧可不進入實施細節，而是只指示模糊方向的漸進指導原則，比方區分絕對、準絕對、相對等情境（Delmas-Marty, 2001: 71-78, 101-102）；設立相關的國際組織須依照更民主的方式，並須跳脫若干過時語境的謎思——比方二戰結束前後的聯合國或一九五〇年代的歐洲共同體。

㈣從求幸福的藝術權建構「文化教育－生活政治－文化全球化」

如果以二十世紀做爲人類文化史的縮本，或可看到：首先，該世紀的前五十年還在西方引領的「現代化」時期，從政府到人民都願設想美好的未來，並在大破壞的不斷經歷中，一再追求大政治或大敘事－這些現象實屬人類史的常態；然後，從五〇年代中期到七〇年代末的西方（尤其是西歐），社會福利的繁榮傲立於美蘇負擔的冷戰，在保障消費時尚的同時則有對時局的無奈，這樣來到了個人幸福取代大敘事，新鮮刺激取代大未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後現代」—— 如果伊壁鳩魯信徒還在滿足於貧窮的小小幸福，[17] 宋代則已享有文學藝術的生活化與平民化（錢穆，1993：193-199）；最後，從八〇年左右西方開始的「超現代」，經濟全球化帶出 M 型社會中的「焦慮個人主義」，[18] 獲利社群自慰的幸福觀近似於種族歧視，全球贏家又拒絕將經濟力量送回民主控制——這種焦慮是否依舊反映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看到深處，二十世紀的人際或社會問題並未脫離既往歷史，差別主要只在物質環境。因此，或能在國家的文化教育層建構一組二項式：「酒神理性／關雎理性」。這裡的「理性」表現如時代知識的教育設計，酒神和關雎則隱喻了兩種態度或意向（intention）：酒神採尼采的論點，祂的激情狂放加上日神理性才得出完美的悲劇，而當尼采誇讚《卡門》最後一句歌詞：「我殺了我崇拜的卡門」（Nietzsche, 1986: 285），正象徵了從神界到人間所追求的絕對掌控；《關雎》透過雎鳩、荇菜、淑女君子三組生命，和樂地進入琴瑟鐘鼓禮樂之道，恰如孔子盛讚該詩「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之二十章），正暗示了講求節制的適度協調。誠然，酒神不是西方獨有，關雎也非中國全部；它們所涉的理性教育都有助於科技研發，但各自背後的意向則影響了從國內到國外的進展方案。

然而，科技的突飛猛進和資本主義的破壞性創立，畢竟影響到物化環境下的理性；成長型失業伴隨著全球風味，同化爲焦慮中的時尚主義；電子影像的流動文化降低了思考的時間，卻加速了個體去追求「生活政治」：鮑曼（Z. Bauman）說它取代了集體追求的大寫政治（2005：61），李歐塔說它只關注平凡小敘事而拒絕繼承現代偉業的大敘事（Lyotard, 1988: 32），紀登斯說它擺脫解放政治而追求個人在日常生活中自我實現的政治（Giddens, 2000: 137），它再次結合起個人主義並進而追求起個人的「生活風格」。然而，時代科技的速度感一直在發揮作用，淺碟式「公認」概念拜服於時尚的腳前：消費者的生活風格緊隨著廣告和商標的慣性與惰

[17] 他們強調某種聰明的滿足，比方「新鮮的空氣，便宜的食物，適中的房屋，一張床幾卷書，一個朋友」（Durant, 1972: 277）。

[18] 「超現代」（hypermoderne）的「焦慮個人主義」爲 G. Lipovetsky & S. Charles (2004) 的說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性，個人滿足則始終是透過前在設計而被勾畫完成。然後，個人風格所臣屬的時尚，卻是在時間上強調求新變動、階級上企求向上變動，依舊是徹底合乎資本主義精神，也就要一再回到全球大多數人的社會正義問題。於是，就像第一邊界要素的藝術權可二分爲物化藝術和生命藝術，現在第二邊界要素的生活政治可以建構出二項式「生活風格／生命策略」：前者的個人性實際簇擁於物化的數量中，後者的個人性則更重在精神的質量裡。換句話說，生命策略隸屬於真正的知識份子，需要的是「士」的養成：他仍然肯定追求富庶的社會，但他自己要追問「孔顏之樂」——即便能像伊壁鳩魯信徒那樣的安貧，卻更嚮往能爲天地生民盡心立命的樂道，並且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對社會追求的是「庶富教」（《論語》子路之九章），對國際講究的是「化成天下」（《易經》賁卦），而這一切竟似仍要來到「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大學》）。

「天下」是國關結構圖第五層的代名，它可以是「世界」的另一個名稱，但在國關涵意上則有層次之分：這裡談到世界時，是從自己的立場去思索世界；但若談到天下，則是爲全世界設想，[19] 是老子所謂的「以天下觀天下」；並可以透過這樣的天下觀，來瞭解《易》理所謂的「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是在這樣的邏輯下，文化全球化可以建構出二項式「消費主義／人文化成」。

上頭曾提到二十世紀與從前不同的「新」問題，指出主要是在物質環境：這裡，是高科技所造成物化程度和快速時尚下的消費繁榮；這裡，享受消費的個人主義得出一個新模式：我消費，所以我存在。就在政治全球化的制度尚未建立之前，消費主義將資本主義全球化發揚光大，並建構出文化全球化裡的消費戰略：非理性的理性化、差別的標準化、以破壞穩定來獲得穩定（Bauman, 2005: 209）。這樣再回轉到政治正義軸端：「弱小國家」更利於跨國集團的擴張；回轉到生存倫理軸端：社會福利的國家陷於沒落的潮流；回轉到繁榮經濟軸端，新富人不再需要新窮人，從而出現了某些公式如：沒有烏托邦的馬克思主義＝沒有工作的資本主義，虛擬納

[19] 趙汀陽曾以專著《天下體系》來發揮類似觀念（趙汀陽，2005）；唯必須提醒一點，即中國人有很長時間認定中國就是天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稅人[20]＝無工作資本主義＋無稅資本主義（Beck, 1999: 133, 7）；然後，這一切又進一步壓抑了從消費焦慮到生存焦慮的個人主義。

結論：阿弘的啓發

阿弘曾談到康德在哲學人類學上的三個提問：我能夠知道什麼？我應該知道什麼？我有權期待什麼？然後他將之加上一個按語「在歷史中」，即讓這三個提問轉往另一個方向，從而在法蘭西公學正式開講他的《歷史課》（Aron, 2003: 16）。誠然，我遠遠搆不上阿弘的博學睿智，但他的做法還是給了我很大啓發，讓我想到在這裡重提這三個問題，只是按語改爲「在國際關係中」：

首先是我能知道什麼？這是個認識論的問題：任何方法論都涉及認識論上的基礎判斷，儘管我不能掌握所有的方法論，但至少就我所熟悉的結構主義符號學而言，我能知道它有助於在國際關係學上建構出合理的「結構化」理論，其中包括一系列飽含異同關係和灰色過渡地帶的二項式類聚體，並從而組合爲可以系統性描述的結構圖式組合段。

然後是我應該知道什麼？這就要求我將結構造型進行理論實踐，亦即落實爲我應能建立的國際關係結構圖：我首先確立了「邊界間性」這樣的國關性特殊符碼，訂定了倫理與價值的國關十字軸，再就特殊符碼與非特殊符碼畫出了一張四方五層的結構關係圖，並進一步尋列出一系列的二項式。我應該知道這張包括大大小小二項式的結構圖還有太多的改善空間，而借用英加登「作品」現象學的說法，它就像一份樂譜那樣，只是做爲物質形式承載物的書寫記錄；它將透過我之後不斷地應用檢證，而成爲進一步正在完成中的作品。

於是來到了我有權期待什麼？我期待藉助這張結構圖，可以釐清若干國關理論在國關學史裡面的適當位置，可以處理西方烏托邦工程與君主寶鑑派等的政治理論，可以建構中國先秦時代儒道墨法等家的國關理

[20] 「虛擬納稅人」指經濟全球化下的跨國企業家，他們可以自行決定投資、生產、納稅與居住的各種不同地點，並於這些地方挑撥離間（Beck, 1999: 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論……。

我了解到在此企圖心下建構結構化理論的龐大難度，但我還是相信應有勇於一試的必要，然後也自然期待有人願接受這項嘗試－儘管它也勢必接受許多批判或建議。[21]

誠然，毋庸諱言，上面提到釐清國關理論位置的第一項期待，既是我要設計結構圖的主要動機，也是還想繼續深化結構圖的基本程序。事實上，圖中提出的各層二項式場域要能不斷地闡發和修正，務必經過現實事務的在在檢驗；於是，這就又回到了康德式的第一項提問：我所能知道的國際現勢與國關理論到底是怎麼回事？這裡顯然涉及兩個層次的問題：一是較偏重現實真相，它既擴及日常發生的國際「大事」，也涉及不同國關理論所看重的相關事務；另一則更偏重於真理面：它是用什麼方法得到的？其本體論與認識論的關係如何運作？在這樣的關係運作下，其分析技術能達到什麼樣的成就，又必然會有什麼樣的侷限而又能否超越這侷限？

就第一個真相層次而言，這正是國關結構圖要做出認知與判斷的主要對象。它可以隨時將日常大事放進圖裡的一定位置，作出最尋常卻也較可靠的檢視，而其信念毋寧是「披沙揀金，往往見寶」。但它也可以將若干國關理論所關注的事務置入研究，尤其國關理論就像所有政治理論一樣：它們屬於社會實踐理論，也就務須放進現實界來檢驗。於此，國關結構圖做爲一種整體性的結構設計，它首先就要能提供分類辨識的功能與方案，比方將這張圖作出幾何切割：從最中間的文化核心的中心點出發，向最外方框的四個框角劃線，即能在由小而大的五個層次上，得出四組等邊三角形。[22]

且以瓦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來看，其「兩級均勢論」位居朝向右

---

[21] 按：原來論文結束於此，但基於兩位審稿人的意見：一位希望能將此結構圖「進一步對比現存理論並進行『比較性批判』與『操作性解釋』，則將更爲完美而精實」；另一位建議「就本文主張之本體論與認識論間關聯性與國際關係主流學派進行比較，將有助於讀者掌握本文所處位置之所在」；所以又在結論處增加了第二部份。這樣做法當然不能全然符合兩位審稿人的設想，但我以爲在這新增的內容裡，已足夠表達適當的理由－而且，畢竟兩項工程的規模都會太也龐大。

[22] 這裡必須承認製圖上的缺陷，由於個人能力有限，所以讓這張原應爲正方形的圖，暫時變成了長方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方「生存倫理」的正三角形，並佔據了其中上半部的直角三角形。在他這本書裡，正義倫理和幸福價值顯然上不了國際政治的檯面，而繁榮價值則是要多多地朝生存倫理靠攏－這特別是因爲他堅決否認一項普遍意見，即貿易互賴能避免戰爭。他從文化核心裡的社會人出發，而堅持敵我分際；他的國際無政府狀態，立基於「缺乏合法壟斷暴力的機構」－這其實是對照國家擁有軍警合法性的特質而來。於是，生存倫理等邊三角形被整齊地劃成兩半：人口生殺權、國內社會警政、國際霸勢之路與全球均勢戰略聯成一線。這樣一個偏向右上方的直角三角形裡，涵攝了瓦爾茲的國關認知情境，並進以推出某種兩級均勢的實踐理念。

再轉到吉爾平的《全球政治經濟學》來看，其「霸權穩定論」看似據有右方與下方合成的大直角三角形，實際上卻還要內分爲兩個等級：下邊正三角的繁榮價值爲第一級，右邊正三角的生存倫理爲第二級。對吉爾平來說，霸權穩定論立基於國際政治經濟學，後者的關鍵在大國與市場：一方面，儘管全球經濟繁榮有賴於大國政治社會結構的穩定，但大國卻要以經濟實力爲依歸；另方面，沒有國家可以不靠世界貿易致富，但全球市場須由大國訂定制度。從而若將霸權穩定論說白了，即大國主導全球市場經濟而帶來繁榮：右邊的生存問題不再是大國的焦慮對象，其霸道的主體堂皇移轉到下方的繁榮價值。換句話說，儘管吉爾平在本書中，數次自謂政治重於經濟，唯實際上更是一再強調經濟實力與維護對策。事實上，這項移轉爲繁榮霸權之後的內容，還可以經由其五個層級作更深入的瞭解：文化核心從社會裡生意人的敵我出發，特別強調科技因素所代表的權力意義，然後一切以本國經濟利益爲依歸；從而當吉爾平看待市場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毋寧更在意於霸權穩定所需的具體實踐方案：一要能補貼本國出口貨，二要抓緊科技專利權，三要主導全球市場經濟的制度訂定。

然而，上面所做的兩個事例分析顯有不少缺陷，而有待補全。比方第二層裡的責任倫理和心志倫理有何作用？物化及其所衍生的商品拜物教又會有何影響？再比方像各國政體問題，它雖未進入兩部著作的國際關係範疇，但這是否對兩位作者言實屬不言自明呢？或是否曾在他們其他的著作中已有申論呢？這樣下去，有待研究的範圍就要擴至極大。從而似很顯然，在本論文裡，要對當代國關主流理論進行結構性檢驗，大概只能作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某種程度的點到爲止。

再就第二個真理層面來看，我個人以爲這屬於廣義的方法論策略：任何研究方法的提出，必有其本體論與認識論的歸屬，還有對相關分析技術的實用籲求。從而，就結構化的角度來看，似乎需要另尋一張方法論的總譜。[23] 它或許可以藉助於符號學而建構出來，但至少不是眼下這張結構圖所能承擔。誠然，我在前面透過一些認識論的概念，來建立自己方法論的正當性；事實上，我也可以藉自己認知的相關概念，附帶性點出某些著作的認識論問題－比方說瓦爾茲以批評歸納法和個體還原主義起家，可他所做的一切推斷都與歸納有關，它所偏愛的整體還原主義也有一定缺憾；至於他自詡其結構主義方法的優越性，卻是一面陷進了科學主義的謎思，一面未理會真正法國結構主義在分析技巧上的豐富性。然而，如果沒有適當的總譜，想要將方法論聯繫起國關諸家理論進行比較，怕是難免流於各說各話的無謂爭議。於是，這又來到有權期待的康德式提問，即寄望於國關學界能理出方法論的總譜。

無論如何，這張總譜不屬於前面對結構圖所規劃的一系列期待，而是與結構圖一道並立著。此外，當上面提到瓦爾茲有關兩級均勢的實踐理念，又提到吉爾平設想霸權穩定的實踐方案時，其實已涉及到另一項並立等級的理論建構，亦即爲處理政治實踐而串連起意識型態、政治傳播、制度分析與法治實踐等的「制度化」（instituitionalisation）理論。然後，在結構圖、方法論總譜和制度化這條線上，是否還需要一種描述並澄清國際事件的「敘事理論」、一種對國際關係進行意義調配的「意義理論」……？這一切似在指陳一樁事實，即國際關係學的「元理論」還待建立中。

[23] 必須指出已有不少人做過相關研究，比方李義虎（2005：51-57）、石之瑜（2005：166-19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Aristotle 著，吳壽彭譯，1981，《政治學》，北京：商務。譯自 *ΠΟΛΙΤΙΚΑ*.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0.

Aron,Raymond 著，馮學俊、吳泓緲譯，2003，《論治史》，北京：三聯。譯自 *Leçon sur l' Histoire*. Paris: Fallois. 1989.

Bauman, Zygmunt 著，郇建立譯，2005，《被圍困的社會》，江蘇：人民。譯自 *Society Under Sieg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2.

Beck, Ulrich 著，孫治本譯，1999，《全球化危機：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台灣：商務。譯自 *Was ist Globaliserung?*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98.

Bernal, J.D. 著，伍況甫等譯，1959，《歷史上的科學》，北京：科學。譯自 *Science in History*. London: Watts & Co. Ltd.. 1957.

Delmas-Marty, Mireille 著，羅結珍、鄭愛青、趙海峰譯，2000，《世界法的三個挑戰》，北京：法律。譯自 *Trois Défis pour un Droit Mondial*. Paris: Seuil. 1998.

Durant, Will 著，幼獅翻譯中心編譯，1972，《世界文明史第七冊：希臘的衰落》，台北：幼獅。譯自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The Life of Greece: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Greek Freedom & The Hellenistic Dispersio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39.

Feenbeg, Andrew 著，韓連慶、曹觀法譯，2005，《技術批判理論》，北京：北京大學。譯自 *Transforming Technology: A Critical Theory Revisited*. New York: Oxford. 2002.

Foucault, Michel 著，錢翰譯，2000，《必須保衛社會》，上海：人民。譯自 *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Paris: Gallimard. 1997.

Foucault, Michel 著，佘碧平譯，2002，《性經驗史》，上海：人民。譯自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Paris: Gallimard. 1976/198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Giddens, Anthony 著，田禾譯，2000，《現代性的後果》，上海：譯林。譯自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0.

Lilla, Mark 著，閻紀宇譯，2003，《當知識份子遇到政治》，台北：雅言。譯自 *The Reckless Mind: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 New York. 2001.

Lipovetsky, Gilles & Charles, Sébastien 著，謝強譯，2005，《超級現代時間》，北京：中國人民大學。譯自 *Les Temps Hypermodernes*. France: Grasset & Fasquelle. 2004.

Mann, Michael 著，劉北成、李少軍譯，2007，《社會權力的來源.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譯自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Montesquieu, Charles-Louis de 著，張雁深譯，1982，《論法的精神》，北京：商務。譯自 *de L'Esprit des Lois*. Paris: Garnier Frere. 1949.

Nietzsche, Friedrich 著，周國平譯，1986，《悲劇的誕生－尼采美學文選》，青海：人民。譯自 *The Birth of Tragedy*. 1872.

Perez, Carlota 著，田方萌、胡葉青、王黎明、劉然譯，2007，《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譯自 *Technological Rrvolutions and financial Capital*. Carlota Perez. 2002.

Polanyi, Karl 著，馮鋼、劉陽譯，2007，《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浙江：人民。譯自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2001.

Rossman, G. Parker 著，范怡紅譯，2007，《未來的研究：解決全球危機－任重而道遠》，青島：中國海洋大學。譯自 *The Future of Higher (Lifelong) Education: For All Worldwide, A Holistic View (Volume II: The Future of Reserch: on Global Crises, still Primitive?)*. http: ecolecon.missouri.edu/globalresearch/chapters/index.html. 2006.

Schmitt, Carl 著，劉宗坤等譯，2003，《政治的概念》，上海：人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譯自 *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63.

Sismondo, Sergio 著，許爲民、崔海靈、陳海丹、孟強譯，2007，《科學技術學導論》，上海：世紀。譯自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and Tecnology Studie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4.

Weber, Max 著，錢永祥譯，1985，《韋伯選集 I：學術與政治》，台北：允晨。譯自 *Science as a Vocation; Politics as a Vocation*. Munich: Duncker & Humblodt. 1919.

Wittgenstein, Ludwig 著，陳嘉映譯，2001，《哲學研究》，上海：人民。譯自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Oxford: Blackwell. 1953.

李義虎，2005，〈關於國際關係理論的本體論問題〉，郭樹勇（編），《國際關係：呼喚中國理論》，天津：人民，頁 51-57。

錢　穆，1993，《中國文化史導論》，臺北：商務。

錢　穆，2000，《現代中國學術論衡》，臺北：蘭臺。

趙汀陽，2005，《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江蘇：江蘇教育。

朱光潛，1981，《西方美學史》，北京：人民文學。

石之瑜，2005，《社會科學知識新論－文化研究立場十評》，北京：北京大學。

二、法文部分

Barthes, Roland. 1964. *Essais Critiques*.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Barthes, Roland. 1965. *Le Degré Zéro de l'Ecriture*. Paris: Gonthier.

Delahaye, Yves. 1977. *La Frontière et Le Texte: Pour une sémiotiqu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s*. Paris: Payot.

Kojev, Alexandre. 1947. *Introduction a la Lecture de Hegel*. Paris: Gallimard.

Lyotard, Jean-François. 1988. *Le Postmoderne expliqué aux enfant*s. Paris: Galilée.

Merle, Marcel. 1982. *Sociologi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Paris: Dalloz.

Popper, Karl. 1996. *La Télévision: Un Danger pour la Démocratie*. Tran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 Orsoni. Paris.

Saussure, Ferdinand de. 1980.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Payot.

Sauvy, Alfred. 1959. *Théorie Générale de la Population (II)*. Paris: PUF.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harting the Structur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Essay about the Sem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siao-Ping Yen**

Abstract

Supposing that al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re only different parts in the process of「structuralisation」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e will use semiology to try to construct, step by step, a structural char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y firstly recognizing the「interfrontierality」as a specific cod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e will then construct an axis between the two binary groups in the domain of ethics and values. With help in specific codes and non-specific code we can distinguish five steps: the cultural core, the elements of power, politics of domestic affairs, boundary elements, and Tianxia. Each lever consists of four sub-binaries. Finally, we will determine within the structural chart the exact form, position and meaning of each different theory during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structure and deconstruction.

Keyworks: Structuralisation, Semiology, Interfrontierality, Structural Char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E-mail: hpyen@faculty.pcc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